

互文理论视域下的理雅各与高本汉《尚书》译本比较研究

沈思芹*

目 录

1. 引言
2. 理雅各、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互文性特点
3. 理雅各、高本汉《尚书》英译差异的互文性解析
 - 1) 理、高《尚书》英译目的差异与互文历史性
 - 2) 理、高《尚书》英译语义差异与互文历史性、主体性
 - 3) 理、高《尚书》英译方法差异与互文历史性、主体性
4. 结语

中文摘要

《尚书》是中国“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是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中国经典之一，其中著名的英译本即包括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与20世纪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尚书》译本。这两种英译相隔近一个世纪，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两位译者所参考的互文本存在历史性差异，他们对互文本的选择、吸收及转化具有主体性差异，这些皆是这两种英译对《尚书》的诠释与传译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从互文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尚书》英译的研究，深入把握西方《尚书》英译的发展特征与规律，也可为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翻译教学、汉学等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经典；《尚书》；《尚书》英译；理雅各；高本汉

* 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1. 引言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¹⁾ 蔡沈在《书集传·序》中说：“二帝三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²⁾ 《尚书》因其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等价值，早在四百多年前即被译介到了西方，又被不同时期的不同西方译者们复译。1865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英译了古文《尚书》，该译本长期为西方学者们所推崇，被视为这部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1948-1949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英译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译文刊登于《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1950年又出版了其校订本。对于理雅各与高本汉的《尚书》英译，学者们主要做过以下比较研究：葛厚伟（2016）³⁾ 基于《尚书》多个英译本语料库对译本词汇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其中即包括理氏和高氏的英译本；林风（2012）从阐释学的视角，从语言和文化的翻译方面对理雅各、高本汉等四位译者的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⁴⁾ 沈思芹（2017）对理雅各、高本汉《尚书》英译的注释进行了比较研究。伍雨晴（2020）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对理雅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分析了译者对原文选材、翻译策略、文化差异处理、译本思想与意志的表达等方面的特点。⁵⁾ 毛耀辉（2022）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对19世纪以来《尚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理雅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本。⁶⁾ 这些研究皆拓展了对西方《尚书》英译的认识，但从互文理论的视角对这两种《尚书》英译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在互文理论的视域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以进

1) 钱宗武解读，《尚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 蔡沈，《书集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 葛厚伟，《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词汇特征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6年。

4) 林风，《〈尚书〉四译本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5) 伍雨晴，《译者主体性视域下〈尚书〉两英译本比较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20年。

6) 毛耀辉，《跨文化传播与接受：19世纪以来〈尚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

进一步深化有关认识,有助于中国典籍翻译等研究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2. 理雅各、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互文性特点

20世纪60年代末,在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符号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俄国文论家巴赫金(Бахтин,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的研究基础上,突破了结构主义自足、封闭的二元观,率先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概念,涵括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领域,已广泛应用于诗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研究。

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首次在文学理论领域进行了深度阐释,指出了“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她曾谈到:“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结构主义对主体性与历史的引入是一种新的突破。⁷⁾互文性使得结构主义有了新发展,它将语言、文学、艺术等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都纳入到社会、政治、宗教等的文本历史。⁸⁾作为一种跨学科文本理论,互文理论对于语篇的生成与理解等皆具很强的解释力。

文本的翻译涉及历史、文化、社会、语言等跨学科的文本理解与诠释。翻译主体既是原文及其互文本的读者,又是译文作者,因此翻译研究既涉及语篇理解,又涉及语篇生成,而这正与互文理论的研究相契合。在互文理论的视角下,理氏和高氏是《尚书》原文及其互文本的读者,二者对原文的理解体

7)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黄蓓译,《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当代修辞学》第5期,2013年。

8)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2004年版。

现于其译文与注释。二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阅读皆包含了历代学者对《尚书》的注解等有关资料, 这些资料与《尚书》皆有互文关系; 译者的译文写作基于其互文本阅读, 因而其对有关互文本阅读、吸收、转化的不同, 对译文意义的构建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互文具有历史性, 理氏翻译当时及之前的所有互文信息与理氏译本又成为可供高氏阅读、参照的互文, 但理氏无法阅读到其后高氏可以阅读到的互文本, 从而二者所阅读的互文本信息存在历史性的差异, 这些互文本阅读的差异也是导致其译文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不同阅读与翻译主体对有关互文本的吸收、转换各异, 因此互文的主体性也是理氏、高氏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3. 理雅各与高本汉《尚书》英译差异的互文性解析

文本是众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 具有一种互文性。⁹⁾ 克里斯蒂娃认为, 文本是一种超语言学机器, 瞄准的是交际对话与此前及同时的各种话语所发生的关系, 并以此而重新分配语言秩序, 因此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由于翻译也是一种文本生产, 也必然经过一个译者与其当时及之前各种互文话语对话的过程, 因此, 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翻译, 与他们对原文本互文的阅读、吸收等参考密切相关。考察理氏与高氏《尚书》英译的差异, 可发现其主要原因即在于二者对《尚书》互文本阅读、吸收、转化等参考的不同。

1) 理、高《尚书》英译目的差异与互文历史性

广义的互文性将他人话语、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等文本外部因素都纳入了文本。¹⁰⁾ 这些因素构成某种前文本历史语境, 由于不同的前文本历史语境的影

9) 王瑾, 《互文性》,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5页。

响，译者翻译目的各不相同。导致理氏、高氏《尚书》英译目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其前文本历史语境。

由于理氏自幼在宗教氛围的家庭中成长，“信仰是理氏一生成就的主要驱动力”¹¹⁾，其视传教为毕生的神圣使命，因此全面解读与传播《尚书》等中国古代经典，为当时的传教士们和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服务，即成为理氏翻译的重要目的。他认为翻译能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使传教士能习得足够的中国的文化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保障传教工作的长期稳定发展，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对传教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¹⁸

同样地，受到翻译当时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高本汉注重通过大量的中国古代文本来考辩《尚书》原文词语的语义，注释原文中难以理解的词语。例如，高氏将《诗经》等作为语言研究的语料去构拟古汉语的语音系统。¹²⁾ 在《诗经·国风注释》的前言中，高氏指出：学生在阅读《诗经》的过程中，对于文本的理解既要确定那些难懂的词语的意义，又要通过阅读诗歌来总体理解与把握诗歌的主旨，而对词语意义的正确理解是非常基础、重要，因而是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单个词语，就无法理解诗歌的整体意义与主旨。²²⁾同样的目的和方法也被运用于《尚书》的注释和翻译，高氏注释《尚书》在先，以此为基础形成《尚书》译文。

由此可见，理氏、高氏《尚书》英译的目的分别体现了各自的前文本历史语境，二者翻译目的即植根于各自的互文历史。

2) 理、高《尚书》英译语义差异与互文历史性、主体性

理氏、高氏《尚书》英译本存在着宗教色彩、译文语义、翻译方法等主要

10) 同上注9。

11)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4, 1942.

差异, 这些差异与二者的互文历史性、主体性密切相关, 其对有关互文本的吸收、引用、转化等参考的不同, 对这些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1) 理、高《尚书》译本宗教色彩差异的互文性解析

广义的互文性将前文本的社会、政治、宗教等历史元素都纳入文本的历史。由于理氏、高氏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二者翻译当时所受所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各不相同, 彼此的个人经历也不同, 这些皆构成其译本的互文历史。理氏译文有着较明显的宗教色彩, 这与高氏译文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二者的互文历史差异, 也受到互文主体性的影响。

17-18世纪的关于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研究被理雅各当作了翻译《尚书》的互文参考资料之一。如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的《中华帝国全志》¹³⁾等汉学著作皆认为古代中国经典《尚书》等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印记。来华传教的一些法国耶稣会士, 如白晋、马若瑟等运用索隐法和象征论对中国经典进行研究,¹⁴⁾ 在中国典籍里面“寻找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原为一体的依据”,¹⁵⁾认为“儒教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¹⁶⁾第一代英国新教传教士米怜等即认为:“一些人断言, 中国的早期著作包含着神圣存在, 由

13) R.Brook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 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M]. London, printed for J.Watts (The first edition, 1736). The third edition, 1741, pp.115-117.

14) 戴密微著, 胡书经译,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 《汉学研究》第1集,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年版。

15)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6) Lauren F Pfister.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Part II)" [J].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iii, 1991, p.43. Lauren F Pfister. *The legacy of James Legg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 vol.22, No.2, April, 1998, p.81.

于《尚书》是远古时代的作品，那时传统的启示之光还没有被遮蔽。”¹⁷⁾ 这些社会历史因素皆成为理雅各英译的互文信息，理雅各虔诚的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和个人经历等构成了其翻译的互文历史，因此可说这些互文因素导致了其《尚书》翻译目的的形成，使其英译与高本汉的《尚书》英译有着诸多差异。例如，理氏在注释中总结《虞夏书·尧典》第11段的大意时评论说：“文章所记载的泛滥的洪水被西方作家称为‘尧时期的洪水’，经过研究，已经可以判定其为诺亚时期的洪水（and it has been endeavoured to identify it with the deluge of Noah.）”。¹⁸⁾ 又如，理氏注释“肆类于上帝”（《虞夏书·舜典》）时评论说：“‘上帝’一词，可以使我们理解为至高无上的上帝(God)。一直到中国的周王朝，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证据皆只能把‘上帝’看作我们那个至高无上的God”“不能怀疑此处的‘上帝’就是真正的God。”¹⁹⁾

而高氏翻译时并无论及“帝”与宗教的关系。根据高氏对《尚书》字词的1256条注释即“肆类于上帝”的注释，可以看出其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寻原文中的一些疑难字词的真正语义，而这种研究方法也是理氏所处时代的学者们尚未能采用的。例如，高氏收集有关语料，将涉及“肆类”的语义分为四类，再分别进行分析，如分析了夏侯、欧阳学派及郑玄等学者的有关注解，再对这些语义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肆类”的意思只是一般的祭祀术语，因为其他说法皆无早期文献的用例可作依据。他在引述周文王祭拜诸神时，将“上帝”译为“God on High”（上天之神），²⁰⁾ 尽管受西方思维框架的影响，高氏也使用了宗教词语“God”，但高氏并无理氏那般着重对其进行宗教意味的诠释，其译文的宗教色彩大为淡化，这也显示了高氏并没有同理氏那样吸收有关宗教的互文信息。由此可见，二者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等互文因素影响了其译文的

17) 刘立壹，《麦都思的翻译、学术及宣教活动》，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92页。

18)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The Chinese Classics[J].* and copious indexes. volume III.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 p.16,p.24.

19) 同上注26, p.34.

20)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 20, 1947-1948, pp.79-80.

宗教色彩。

(2) 理、高《尚书》英译语义差异的互文性解析

理氏与高氏《尚书》英译的互文历史性与主体性差异也深刻影响了其译文对原文的语义诠释和传译，使二者对于相同的汉语原文，其译文语义存在着某些差异。理氏译文是其与当时的中外有关著名学者合作的产物，如其翻译助手王韬等，这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造诣，其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方法、经典诠释理念等，对理氏的翻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中国学者们的影响，其《尚书》译本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精神气质。理氏在翻译中对诸多《尚书》有关注释、研究、翻译等互文本的研究和吸收，体现了其互文主体性特点，其译文前文本的意义实践构成其互文的重要内容，这些互文参考深刻影响着其译文的构建，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文本具有生产力”。²¹⁾而高氏翻译的前文本意义实践则有所不同，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者来说，如果只从郑玄等中国学者的注释中得到一些有关解释是不够的。虽然当时很多有关注解已经被收集，留作辨别语义之用，但是仍然亟待通过对其进行研究，以得出更为确定的结论，而且那些杰出学者们的著作中也存在着需要修正的错误²²⁾。因此其《尚书》译文以之前对原文疑难词语意义的考辨研究——《尚书注释》为基础，旨在提供语义更为准确的译文。其注释分析了历代中外学者的有关注解等互文信息，体现了其互文主体性的特点。例如，通过分类比较，来推断最有可能的语义，然后用推断清楚的语义来诠释传译原文。通过比较二者的注释可发现其互文主体性差异，这也是译文语义差异的重要成因之一。

如对于“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句的翻译，理氏、高氏的译文如下表1：

21) 同前注16.

22)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4, 1942, p73, p81.

表1：“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译文

今译	(普天之下) 至于海内的百姓, 各个诸侯国的众位贤人。(虞夏书·皋陶谟) ²³⁾
理译	“even to the grassy shores of the seas, and in the myriad States the most worthy of the people will all wish to be your ministers.” 甚至到海边长满青草的海岸, 在无数的小国之中, 最值得尊敬的人们都希望成为您的臣子。 ²⁴⁾
高译	“even to the corners of the seas, the numerous (conspicuous ones=)eminent men of the(greenly-growing) flourishing myriad states all together are the servants of the emperor”。即使到了大海的角落, 那些(蓬勃发展的)小国的众多(显赫的)杰出人物都是皇帝的仆人。 ²⁵⁾

从表1可见, 理氏与高氏的译文语义都与汉语今译有着明显的差异, 彼此语义也有较明显的不同。

二者对上例“至于海隅苍生, 万邦黎献”翻译的不同, 其原因之一是不同的句读标点方式。《古文尚书》中通常为独立两篇的《皋陶谟》与《益稷》, 在所谓《今文尚书》中合为一篇。据此, 高氏翻译的汉语底本应为《今文尚书》, 理氏则为所谓《古文尚书》, 高氏所译篇目包含于理氏所译。考查二者的汉语原文, 可发现高氏译本中汉语原文与理氏译文的原文断句并不相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二者的译文语义传译。现将其比较如下表2:

表2:对“至于海隅苍生, 万邦黎献”的不同断句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五, 第三十一页)	蔡沈《书集传》(文渊阁《四库全书》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理氏 The Shoo King	高氏 The Book of Document
“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	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	“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	“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

上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对此句的解释为:“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

23) 江灏, 钱宗武 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3页。

24) 同前注26, p.83.

25) Bernh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J]*.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2, 1950, p.11.

言所及广远。”²⁶⁾由此可见高氏、理氏与当时的官方版本皆有较大差异，这也反映了两位译者对原文及其互文本阅读、吸收、转化的不同。

从二者对这句话的注释，也可看出二者对于互文本吸收的主体性差异。如下表3：

表3：“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的有关注释

理注	“海隅苍生”，“隅”同“角”，“苍生”在《御制日讲书经解义》中注解为“黎民”，即指的是“所有的人”，这个词组现在常带有此语义，但这尚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秦朝以前并无此种语义。“苍”可能指草的颜色，孔安国将它与“海隅”相连，解释为：“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黎献”的“献”等于“贤”，指有智慧的贤才良士（参见《论语》），“黎”可能为“所有”之意，或指“黑发人之中聪慧贤能之人”。
高注	《尚书注释》第1326条（P129）注释了“苍”为绿色、蓝色之意。对其语义的观点可分为三大类：不可能是第一类这种长到了海角的绿色植物之意，因为那种颜色与海、空相交处的颜色不符；第二种观点认为“苍天”与“黔首”同意，即“黑色的头”，指“人民、百姓”。虽然早期文献用过“绿”来表示“暗黑”之意，但是汉朝以前并无此用法的例句；第三种观点包括其他的一些解释，如苍生就是如草一样繁荣发展的许多小国家。关于“献”的意思，《尔雅》认为“献”指的是“圣人”。根据《逸周书》的记载，聪明有智慧之人被称为“献”，但词源学意义上的解释实际上有多种，且各不相同。郑玄认为“献”即“贤”，但是“献”不适宜作“贤”的借词。段玉裁和王引之认为“献”为“仪”的借词，因为《书·大诰》载伏胜实际上用“民仪”来解释“民献”，而且《周礼》中载“献”读作“儀”，包括“仪”。实际上，汉代的几种描述都认为“黎仪”二字组合与《尚书》中的“黎献”同义，这可能是由于今文《尚书》的“黎仪”代替了古文《尚书》的“黎献”的缘故。但无论如何后者“献”不可能是前者“仪”的借词，二者语音差异太大。“献”本意为“赠送、拿出”，例如《诗经》中写道：“献尔发功”，可以很好地证明“献”就是“展示、展出”的意思。因此《尚书》里的“黎献”应该解释为“很多贤能之人”。 ²⁷⁾

由上表3可见，这两种注释主要差异在于译者对互文信息的处理不同，高氏运用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着力对词语的真正意义进行科学考证。理氏则补充说明了有关词语的文化含义等信息，注重有关文化信息的引用和评论，但并未对其进行分类比较。理氏在注释中引用了包括官方权威性文本的《御制日讲书经解义》《论语》及《孔传》等。而高氏注释则引用了《诗经》《周礼》《逸周书》《书·大传》等较早时期的互文本。由此可见，二者所据以构建译

2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版，第143页。

27) 同上注28，pp.129-130.

文的互文信息不尽相同，有着历史性与主体性的差异，由此也导致其译文语义的差异。

又如二者对“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句的翻译，见下表4：

表4：“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句译文

今译	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虞夏书·尧典》） ²⁸⁾
理氏	“Examining into antiquity we find that the emperor Yao was called Fang-hün”。 考察历史可知尧帝被称为“放勋”。
高氏	“Examining into antiquity (we find that) the emperor Yao was called Fang-hün”。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尧帝被称为“放勋”。

虽然这两种译文差异甚微，但是考察二者的对应注释即可发现他们对互文信息的参考、吸收的不同，二者的注释分别如下表5：

表5：“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注释

理注	朱熹断定“曰若稽古帝尧”合为一个结构，中间无停顿，用作编年史的引言，（见《朱子全书》卷三十三《尧典》）。“稽古帝尧”是一个句子，其中“帝尧”作主语，“稽古”为谓语，意为“当我们研究古代的皇帝尧”。郑玄将“稽”等同于“同”，“古”同“天”。意为“尧能够与上天保持一致，他的行为具有与上天一样的美德”。孔子的言论也支持此说。（见《论语》）但是这明显是不可接受的。马融和孔安国有类似注解，毛奇龄视“曰若稽古”为编年史撰写者们用于叙事的古老的程式化用语。（可参见孙星衍的《尚书光听录·卷一》）。“放勋”是否尧帝之名？司马迁、郑玄、马融等皆赞同此观点，孟子似乎也支持此说。但是孔安国首先认为这两字是一个描述性的词组，“放”即“学”，“模仿”，蔡沈赞同此说，将“放”等同“至”，词语意为“极具美德的人”。但最好还是回归古代的观点，否则会难以理解。但若视“放勋”为尧或其他圣人的名字，则不可理解，故应为“号”或“字”。司马迁视尧为“五帝”中的第四位，舜之后，中国的统治者称“王”或国王，直到公元前220年的秦朝。此文中的“帝”是“上天”的同义词，很可能指上帝（God）。《说文》的解释是：“谛”即“判断”，孔颖达扩大了其应用范围，说上天通过皇室统治维护正义，“帝”是早期统治者之名，上天的代理人。
高注	高注1207条：根据李善的注释和东汉的《鲁灵光殿赋》等，可以看出，“粤”应该是“曰”的变体字。历代的有关注解可以分为三大类，根据《尚书》中的《君奭》、《大诰》篇与蔡沈的解释，“曰若”仅作助词，相当于“惟”，无意义。还可参考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与扬雄的动词说、《文选》的《剧秦美新》中的用例、顾赛芬的解释等。显然顾氏忽视了古变体“粤”、“越”。因此可推断：A类注释为同时期令人信服的文本所确证。故这句话应理解为“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帝尧被称为放勋。” ²⁹⁾

28) 同前注第33，第43页。

由上表可见，理氏注释提供了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间包含个人评论，并作出其对译文语义的判断。而高氏注释则重在分类比较分析，而非仅仅介绍与评论。理氏注释并没有引用高氏所引用的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的有关解释，以及杨雄等的观点，这也体现出二者所吸收的互文信息的主体性差异。

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理论注重复杂的话语主体及其历史，即阅读文本不应局限于文本自身，还应该阅读在其之前、之后的文本，即“作者对其他文本的接受，以及读者对作者的接受等”。³⁰⁾理氏、高氏的译文和有关注释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互文读者与译文作者的主体性作用。由此可见，两译本注释与译文对互文信息吸收、转化的差异也影响到其译文对原文的语义传译，导致二者译文的语义差异。

克里斯蒂娃将文本空间分为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三个维度，认为这三个维度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故而可以在水平轴和垂直轴的层面界定词语：“水平轴”指文本中的词语在写作主体和读者（destinateur）层面；“垂直轴”指文本与外部文本的关系，即包括先前文学资料与当下文学资料的集合。³¹⁾因此，影响汉语原文语义的翻译的因素，除了二者互文主体性作用之外，各种互文本历史因素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理氏译本早于高氏译本近一个世纪，因而高氏所拥有的互文本中包含理氏译本，例如：高注“1207”条注释“稽”，即分类比较了理雅各译本、《逸周书》、《汉书·平当传》的《书·泰誓》篇、郑玄的注释、《韩非子》的《主道》以及《周礼·小戴》的注解。此外，至理氏翻译时仍未产生的一些文本，也会进入高氏翻译的互文信息之列，即二者间存在互文的历史性差异。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特别强调着眼于现代视界，运用文本与文化历史语境的互文性关系来解释过去的文本。³²⁾如理氏

29) 同前注第28, p.44.

30) 同前注11。

31) 同前注12。

32) 同前注10。

与高氏对于“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的不同翻译，既体现了二者的互文主体性差异，也体现了其互文历史的差异。如下表6：

表6：“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译文

今译	于是禹被赐予玄色的美玉，表示大功告成了。（《夏书·禹贡》） ³³⁾
理译	“Yu presented a dark gem-stone, and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his work.” 禹呈献了一块深色的宝石，宣布他完成了工作。 ³⁴⁾
高译	“Yu was given(sc. by the emperor) a black kuei sceptre, announcing that he had achieved his work.”禹被（皇帝）赐予一块黑色的珪玉，来宣告他已经完成工作。 ³⁵⁾

理雅各与高本汉此处的译文差异可从其注释中找到原因，虽然他们的注释都引用了同样两位中国学者的注解，但是理雅各与高本汉的观点差别很大，理氏明确表示对不赞成孔安国的注释。

二者的注释如下表7：

表7：“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注释

理注	圭即所谓的“瑞玉”，是一种很珍贵的玉，当时的玉牌分为五种，其中三种称为“圭”，“圭”是皇帝赏赐给大臣的一种授权象征，表示尊贵而有权威。这里所说的大臣把“圭”献给皇帝，这种说法似乎不妥，由于感到很不妥，司马迁便编出这句话来，孔安国对司马迁的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还有其他的关于大禹治水的说法，但都非常勉强。我认为应该是大禹在某个地方得到了一块稀有的深颜色的石头，他认为这块石头非常罕见、珍贵，应该把它献给尧帝。 ³⁶⁾
高注	高注（1396条）则将古代有关语料与注释分为三类进行比较，A类的观点是国王将一块黑色的圭赏赐给禹来宣告他完成了自己被托付的重任，司马迁、孔安国都赞同这种观点。高氏还引用了于省吾的有关研究作为证据，此类结构出现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之中，在铭文中，“X锡”即“X被赏赐了……”；B类的材料是汉代的不同观点，即认为上天把一块黑色的圭赏赐给禹，如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关于圭的碑铭；C类材料是蔡沈的观点，他认为应是大禹把一块黑色的圭献给了皇帝。（理雅各的译文就是按照这种说法翻译的，但他的注释中并未对此有所说明。）综上所述，我们没有道理不采用A类这种年代最早的注释。 ³⁷⁾

33) 同前注33，第65页。

34) 同前注26，p.150.

35) 同前注35，p.16.

由上表可见，与高氏不同，对于较早期的司马迁、孔安国等的注释，理氏不以为然，而是选择了较晚时期的蔡沈的观点。由注释可知，理氏和高氏对于相同互文本（司马迁的观点）的否定与接受，体现了互文阅读中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由于高氏具有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背景，且曾跟随沙畹一起进行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因此他吸收了碑铭文等实证性的有关研究成果。法国汉学家沙畹出生于1865年，理雅各翻译《尚书》时，不可能引用沙畹的碑铭文研究成果。而高氏对这些新的互文本的引用，导致了二者译文语义的差异。

再如：考察二者所列的主要参考资料，也可发现其互文本的历史差异。二者的译文或注释中所列主要参考资料如下表8：

表8：两译本所列主要参考资料

理氏 38)	中国著作：《十三经注疏》、《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钦定周官义疏》、《御制日讲书经解义》、林之奇《尚书全解》、吴澄《今文尚书纂言》、林师凯《蔡传旁通》、《皇清经解》、《古文尚书疏证》、《古文尚书冤词》、《经义考》、《御纂朱子全书》、《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御定康熙字典》、《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昭明文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七史商榷》、《丹铅总录》、《历代统计表》、《历代疆域表》、《大清一统志》、《事物纪原》、《格致镜原》、顾炎武《日知录》等。
	译本与其他外国著作：宋君荣的《尚书》译本（1770）、麦都思的《尚书》译本（1846）、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全名《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1735）查尔斯·郭实腊的《中国古代与现代历史素描》（1826）、俄驻北京大使馆的萨哈罗夫的《在中国存在4000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口的数值关系》等共11本，其中法国的著作占5本。
高氏	最常参考的学者： 上古和中古学者：郑玄（公元二世纪）的注解今可见的均属记录，如载于江声、孙星衍的著述，郑玄老师马融的著述，伪-孔安国（Pseudo-K'ung）（公元三世纪）、孔颖达（自7世纪始）《十三经注疏》、蔡沈《书经集传》 清代及其后学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含于《皇清经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引之《经义述闻》、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枏《今文尚书经说考》、俞樾《群经平议》、（《皇清经解续编》）孙诒让《尚书骈枝》、章炳麟《古文尚书拾遗》、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于省吾《双剑謔尚书新证》

36) 同前注26, p.150.

37) 同前注28, p.167.

偶尔参考的学者：苏轼、林之奇、吕祖谦、朱熹（皆宋代）、吴澄（元初）、惠栋、王鸣盛、段玉裁、孔广森、朱骏声、皮锡瑞、阮元等（皆清代）；王国维、顾颉刚

由上表可见，理氏与高氏所参考的学者既有相同的，也有所不同，体现了二者互文本的历史差异。如高氏参考了章炳麟、于省吾、皮锡瑞、王国维、顾颉刚等的互文本，由于这些学者的研究晚于理氏的《尚书》翻译年代，甚至有的出生于其译本面世多年以后，因此高氏与理氏所吸收的互文有一定的历史差异。

理氏所参考的互文本主要是广泛选取的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有关著作材料。如《历代疆域表》《资治通鉴》《十七史商榷》等。一则由于理氏翻译《尚书》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当时西人为了实现贸易扩张和传教，亟需了解中国文化，其中早期耶稣会士们由于文化差异而传教受阻。再者，理氏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们的影响而尤重历代权威著述。如：《御制日讲书经解义》《御纂朱子全书》《钦定周官义疏》等，也注意参考当时法国著名学者们的一些中国文化研究著述，如宋君荣的《尚书》译本、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查尔斯·郭实腊的《中国古代与现代历史素描》等。而高氏翻译则处于语言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背景，这也影响了其主要参考文本的选择，高氏既重视早期的注解，又重视参考王引之等一些清代著名学者的有关研究，因此二者的互文参考信息具有历史性差异。

(3) 理、高《尚书》英译方法差异与互文历史性、主体性

理氏与高氏的翻译方法不同。理氏主要采取“参考官学，分析考证”³⁹⁾的方

38)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M].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ume III.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 1991, pp.201-208.

39)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M]. Vol.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法，具有传统文献学、经学、训诂学等特征；而高氏则除了采用传统语文学的方法外，还采用了实证性的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从互文理论的视角来看，这与译文写作的主体性以及译文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理氏翻译《尚书》时，潜心研究了大量中国历代学者的注释等文献资料，其《尚书》译本所列的参考文献接近70种，包含古今中外的有关资料。理氏注重官学，参考了各种有关的权威性的互文本，诸如《御定康熙字典》《钦定书经传纂朱子全书》《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

而高氏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可信，他的诠释有主观化的倾向，因为朱熹解释疑难词语的时候认为不一定需要经过早期文本的证实，没有通过研究文献去考察词义，认为符合上下文语境即可，有时相当主观地自创解释。⁴⁰⁾可见翻译方法的不同导致了理氏、高氏互文的吸收的不同，最终导致其译文差异。

表9：“五典”注释

理注	“五典”又称之为“五教”、“五常”，指的是五种永恒的职责，即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五种社会关系中的美德典范。 ⁴¹⁾
高注	“五典”就是“五教”(five teachings)，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些是最早的注释，为郑玄的注释所沿袭，所以应该遵循这种解释，孙星衍也认为应是最早的“五教”之意。此外还有《尔雅》的注释，即认为“典”就是“常”，“五典”就是“五常之教”的意思。班固解释为：“仁、义、礼、智、信”，蔡沈原来认为“五典”即“五常”，后来认同孟子所持的“五伦”说，即指的是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 ⁴²⁾

由上表可见，理氏译文的“五典”正是蔡沈所主张的五种社会关系，虽然他没有交代自己所引观点的出处。显然高氏注重词语意义的早期注解而理氏更偏重权威注解。

高本汉注重全面收集、分类分析各种有关的互文本资料，其中也包括了理

1939, pp.v-vi.

40) 《诗经注释》：p.73.

41) 同前注26, p.31.

42) 同前注28, p.71.

氏的译本。其所作的全部注释皆始终参考其使用《诗经》的字韵构建的古汉语语音系统。⁴³⁾由此可见高氏通过对汉语本体层面进行比较语言学研究,以所推断出的《尚书》原文语词的真正意义进行翻译。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文理论的视域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尚书》英译过程中对原文有关的互文本吸收、转化等参考的不同也是导致二者的英译有诸多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考察二者所参照的互文本资料,可发现由于二者相距近百年,其在翻译中所参考的互文存在历史差异,而由于他们对互文的选择、参照及吸收皆存在主观性的差异,这对二者的翻译目的、译文语义、翻译方法等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在他们的译文和注释等副文本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迹,从互文的视角考察不同时期译者留下的这些印迹,可以发现对同一种原文的翻译,既受到互文历史语境的制约,也受到互文主体性的重要影响,译者本身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知识与素养对于翻译中对原文语义的把握与传译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3) 同上注28, P.43.

參考文獻

- 蔡沈, 《书集传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5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 戴密微著, 胡书经译, 《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 《汉学研究》第1集,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年版。
- 葛厚伟,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词汇特征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16年。
- 黄念然,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理论》, 《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 1999年。
- 江颢, 钱宗武译注,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 陆振慧, 《古代典籍如何译? —比较三个〈尚书〉译本引发的思考》, 《翻译论坛》第3期, 2015年。
- 林风, 《〈尚书〉四译本比较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12年。
- 钱宗武解读, 《尚书》,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版。
-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 2004年版。
-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版。
- 王瑾, 《互文性》,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 王韬, 《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
- 许钧,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 《外语研究》第1期, 2004年。
- 岳峰, 《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 张上冠, 《理雅各 (James Legge) 以意逆志的〈诗经〉翻译》, 香港大学汉学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1997年。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著, 黄蓓译,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当代修辞学》第5期, 2013年。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黄蓓译, 《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 《当代修辞学》第5期, 2014年。
- 伍雨晴,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尚书〉两英译本比较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年。

毛耀辉, 《跨文化传播与接受: 19世纪以来〈尚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2年。

-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4, 1942.
-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0.
- Bernh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2, 1950.
- 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M].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M]. volume III. Taipei :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M]. Vol.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 A. Brook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fical Def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ese 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 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 Done from the French of P. Duhalde. Volume 2 of 4 volumes* [M]. London : printed for J.Watts (The first edition,1736). The third edition, 1741.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nditions of *Shangshu* by James Legge and Bernhard Karlg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Shen Siqin

Shangshu is known as the “ancestor of political books and the source of historical books” in China, with extremely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 by the Westerner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its translation has been popular, and fam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include the translations by the 19th-century British missionary Sinologist James Legge and the 20th-century Swedish sinologist Bernhard Karlgren. Due to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text, examining the relevant intertextual materials referred to by James Legge and Bernhard Karlgre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book reveals that the intertextual materials chosen by the two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textual materials have subjective differences.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i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 theory can not only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space of the translation of *Shangshu*, but also deep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classic. It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inology,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other research.

Key words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angshu*, Chinese classics, *Shangshu*, James Legge, Bernhard Karlgren

투 고 일 : 2024. 4. 10. / 심사일: 2024. 4. 15~2024. 5. 15. / 게재일: 2024. 5. 20.